

ZHAOSHULI WENJI



赵树理文集

中国工人出版社

I 217.2

16

:/

ZHAOSHULI WENJI

中国工人出版社

赵树理文集

1





作者像

赵树理文集序

周扬

工人出版社和山西大学合作编辑出版《赵树理文集》，要我写几句话，并希望将我一九四六年写的《论赵树理的创作》作为前言。我那篇旧作，作为对赵树理同志创作的全面评价，当然是远远不够的，他后来还继续写了许多出色的作品。我写那篇文章时，和这位在文坛初露头角的新星还不相识，只是对他作品的新颖题材和独特风格以及作者的卓越才能感到惊异。全国解放后，我才认识赵树理同志。在二十多年的交往中，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每读他的作品总有一种亲切之感。文如其人。他文好人也好，文章有特色，人也有特色。他最熟悉农村，最了解农民心理；他懂世故，但又像农民一样纯朴；他憨直而又机智诙谐；他有独到之见，也有偏激之词；他的才华不外露，而是像藏在深处的珠宝一样不时闪烁出耀眼的光芒。我喜爱他的为人，甚至对他的某些偏见，也能谅解。他公正无私，对人民忠心耿耿。这是最可贵的。

我没有把赵树理同志的作品全部读完，过去读过的，有的至今记忆犹新，有的就印象淡漠了。对他作品的全面的正确的评价，就让那些有专门研究的同志或研究现代文学史的专家们

去作吧！凡是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总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我同意重新发表我的那篇旧文章，为的是纪念我们多年的文字之交和革命友谊。至于那篇文章本身，现在重新来读，说的并不充分，也不深刻。记得当时就有人说过，赵树理在作品中描绘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严重不纯，描绘了有些基层干部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是化装的地主恶霸。这是赵树理同志深入生活的发现，表现了一个作家的卓见和勇敢。而我的文章却没有着重指出这点，是一个不足之处。

一九五九年，我们党内发生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赵树理同志在中国作家协会，曾为此受到了一些同志对他的不公正的批判，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耿耿于怀，同批判过他的同志还是和睦相处。一九六二年，在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的讨论农村题材的创作座谈会上，我曾为此称赞了赵树理同志这种正确对待自己和对待同志的态度。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赵树理同志就没有能够逃过这一关，终于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而死。就在他遭受残酷折磨，面临死亡威胁的危急时刻，他没有屈服，对革命仍然充满了信心。他在被批斗和监禁的日子里，偷偷地用破纸片写了毛主席的《咏梅》词，以表示他对革命的信念和对党对领袖的一片忠心。他嘱咐他的爱女赵广建同志将这一有他绝笔手迹的纸片设法送到我的手中。那时我早已失去自由，我的命运处于危如累卵的境地。但他还是信任同志，信任我们之间的友谊，相信我们总会有重见天日的一天，相信人民总会重过光明的日子。赵树理同志的信念，也就是我们每个革命者的信念，现在终于实现了。今天，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除了更加紧密团结，更加勇气百倍地工作和斗争以外，还能说什么呢？

一九八〇、四、五

论赵树理的创作

周 扬

在被解放了的广大农村中，经历了而且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农民与地主之间进行了微妙而剧烈的斗争。农民为实行减租减息，为满足民生民主的正当要求而斗争，这个斗争在抗战期间大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地位，因而组织了中国人民抗敌的雄厚力量。抗战胜利以后，减租减息与反奸、复仇、清算的斗争结合起来，斗争正在继续深入发展。这个斗争将摧毁农村封建残余势力，引导农民走上彻底翻身的道路。经过八年抗战，农民已经空前地觉悟和团结起来了。他们认识了他们贫穷的真正原因，他们决心为根本消灭这个原因斗争。他们把斗争会、清算会很正确地叫做“挖穷根”，这就是说，要把贫穷的根子挖出来，将它斩断。农民的革命精力正在被充分地发挥，这个力量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拒抗的，是无穷无尽的。它正在改变农村的面貌，改变中国的面貌，同时也改变农民自己的面貌。这是现阶段中国社会最大的最深刻的变化，一种由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变化。

这个农村中的伟大的变革过程，要求在艺术作品上取得反映。赵树理同志的作品就在一定的程度上满足了这个要求。

赵树理，他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

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他第一篇为人所知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在一九四三年发表之后，立刻在群众中获得了大量读者，仅在大行一个区就销行达三四万册，群众并自动地将这故事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接着发表了中篇《李有才板话》，这是一篇非常真实地，非常生动地描写农民斗争的作品，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杰作。不久以前，又发表了同样主题的长篇《李家庄的变迁》。

我们面前是三幅农村中发生的伟大变革的庄严美妙的图画。

《小二黑结婚》写的是一个农村中恋爱的故事。故事很简单：小二黑，一个特等射手的年轻漂亮的农民，和一位美丽的农家姑娘小芹相好。但是小二黑的父亲二孔明和小芹的母亲三仙姑，这村子里的两位“神仙”，却反对他们的结合。二孔明为他儿子收了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作童养媳，但是小二黑不认账，他对父亲说：“你愿意养你就养着，反正我不要。”小芹也不认母亲为她定下的婚事，把婚礼扔了一地，对母亲说：“我不管！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家走！”你看，他们回绝得多么干脆，多么坚决！当村里恶霸金旺兄弟将这对情人双双拿住，企图诬告他们的时候，小二黑一点没有畏怯，他是理直气壮的，因为他“打听过区上的同志，人家说只要男女本人愿意，就能到区上登记，别人谁也做不了主”。结果，自然是小二黑胜利了。作者是在这里讴歌自由恋爱的胜利吗？不是的！他是在讴歌新社会的胜利（只有在这种社会里，农民才能享受自由恋爱的正当权利），讴歌农民的胜利（他们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懂得为更好的命运斗争），讴歌农民中开明、进步的因素对愚昧、落后、迷信等等因素的胜利，最后也最关重要，讴歌农民对封建恶霸势力的胜利。作者对“二孔明”与“三仙

姑”的描写，算得是够讽刺的了，但当我们看到这两位“神仙”为自己儿女的事情弄得那么狼狈不堪的时候，我们真有点可怜起他们来，待到后来看到他们的转变，简直要喜欢起他们来了。原来作者攻击的对象，并不是他们，而是金旺兄弟，那些横行乡里的恶霸们。

在《李有才板话》中，便正面展开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斗争。斗争围绕在改选村政权与减租两个问题上。老户主阎恒元，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描出了地主的老奸巨猾的性格；他把持了村政权，操纵了农救会。关于他，李有才曾经编过一段快板：

村长阎恒元，一手遮住天，
自从有村长，一当几十年。
年年要投票，嘴说是改选，
选来又逃去，还是阎恒元。
不如弄块板，刻个大名片；
每逢该投票，大家按一按。
人人省得写，年年不用换，
用他百把年，管保用不烂。

李有才，这位农民的天才歌手，用他的快板反映了村子里的事件和人物，表达了农民对于这些事件和人物的情绪的反应。这些快板是多么真实，多么畅快，多么锋利呀！正因为这些快板戳穿了阎恒元们的假面，李有才被他们撵出了村子。农民中的积极分子被打击，分化，收买。年轻，热情，但是没有经验，犯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章工作员被愚弄着，完全蒙在鼓里，他还说阎恒元是“开明绅士”呢，并且还把阎家山奖为“模范村”呢。然而农民们的眼睛是明亮的，他们唱道：

“模范不模范，从西往东看；

西头吃烙饼，东头喝稀饭。”

他们继续斗争着。一个小元变坏了，其他许多“小字号的人物”还是积极的。有才老叔撵走了，还是有人编歌子；他们的嘴是封不住的。当县农会主席老杨同志，这位从群众中生长起来，熟悉群众要求，有群众作风的人物来到村子里的时候，那一伙年轻积极的农民便好像给吸铁石所吸引一样，都团结到他的周围了。他们重新组织起农救会，发动了斗争，改组了村政权，实行了减租法令，斗争胜利了。作者在这里正确地处理了农村斗争的主题，写出了斗争的曲折与复杂性，写出了农村中的各种人物：地主；农民，包括积极的，中间的，与落后的；两种类型的工作干部。他没有把人物与行动简单化；没有只写胜利，不写困难，只写光明的一面，不写阴暗的一面。他的笔是那样轻松，那样充满幽默，同时又是那样严肃，那样热情。光明的，新生的东西始终是他作品的支配一切的因素。

《李家庄的变迁》的主题，同样是写的农民与豪绅地主之间的斗争，而且这个斗争范围更广，过程更长，因而也更激烈，更残酷。前两篇作品所特有的幽默的调子在这里被一种沉重的空气所笼罩。农民主人公铁锁的性格也比那些“小字号的人物”更深沉，他有比他们更多的经历，他的活动更带自觉的性质。全书的故事就是以他作中心来展开的。他是李家庄的一个外来户，受尽了当地豪绅地主的剥削压迫，跑到哪里也逃不出他们的魔掌。只有在太原和一个叫做小常的青年共产党员的偶然相识，才第一次在他的生活史上投射了一线光明。这个小常几乎成了他以及后来他的全村的偶像。抗战开始，小常恰好被派到他们县上来工作，他亲自到了他们的村子里，在这里轰轰烈烈地开展了牺盟会的工作。铁锁和农民中其他积极分子冷元、白狗都活跃起来了。豪绅地主李如珍一伙也在加紧活动；

他们抵抗减租减息，他们想叫牺盟会不起作用。中央军、日本人来了，他们便得志起来，对农民实行了血的报复。小常被活埋了。铁锁、冷元投入了八路军。而当八路军第二次解放这村子的时候，村里剩下的人，连从前的一半都不到了。斗争是残酷的，而且是长期的。作者在故事结尾处写到了庆祝抗战胜利大会本来就可以住笔了的吧，然而他却不能不加写一场为自卫战争欢送参战人员的大会，向读者强烈地暗示了：斗争还在前面！他灌输了读者以胜利信心和斗争勇气。

《李家庄的变迁》虽只写的一个村子的事情，但却衬托了十多年来山西政治的背景，涉及了抗战期间山西发生的许多重要事件，包含了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的内容；可以看出作者在这里有很大的企图。和作者的企图相比，这篇作品就还没有达到它所应有的完成的程度，还不及《小二黑结婚》与《李有才板话》在它们各自范围之内所完成的那样成功。它们似乎是更完整，更精练。但是就作品的规模和包含的内容来说，《李家庄的变迁》自有它的为别的两篇作品所不可及的地方。

在巡视了赵树理同志的这三篇小说之后，我想说一说在他的创作中有什麼特点，什麼独创的地方，特别值得研究，值得学习呢？我打算说两点：一、是他的人物的创造；二、他的语言的创造。

作者在人物创造上，每一个特点就是：他总是将他的人物安置在一定斗争的环境中，放在这斗争中的一定地位上，这样来展开人物性格的活动。每个人物的心理变化都决定于他在斗争中所处的地位的变化，以及他与其他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的變化。他没有在静止的状态上消极地来描写他的人物。

首先，他写了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和工作干部。他们是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创造积极人物的典型，是我们文学创作的一个

伟大而困难的任务。一则因为在我们过去的优秀文学遗产中，许多作品大都只写了农民消极的落后的方面；二则因为现实生活中，新的人物，新的个性还在产生和成长之中。作者虽还没有创造出像阿 Q 那样的典型，但确实写出了新的人物的真实面貌，那些“小字号的人物”们可以看作新的农民的集体的形象。而且，是多么生动的，可爱的形象呵！但是作者也并没有将他们理想化。这些都不过是普通的农民；他们年轻，热情，有时甚至冒失；他们所身受的豪绅地主的剥削压迫，迫使他们不能不走向革命。他们在苦难与斗争中渐渐成长起来，他们渐渐学会了斗争的方法和策略；他们敢说敢干，且又富于机智和幽默。每个人都在斗争中显示出各自的本领与才能，正如《李有才板话》中的老杨同志所说的，“老槐树底有能人”。群众的斗争——这就是决定一切的力量。斗争教育了农民，培养出了他们中间的优秀人物。赵树理同志的创作就反映了农民的智慧、力量和革命乐观主义。在老杨同志这个人物身上，他创造了一个杰出的农民干部的成功形象。

作者同样出色地描写了地主恶霸和他们的“狗腿”。他的重点也是放在他们和农民对立，和新政权对立的关系上。他们对于农民的要求减租与组织农会，改组村政权等等活动，进行了顽强的坚决的抵抗；这种抵抗在不能使用公开暴力的时候就凭借狡猾的手腕；他们“一肚子的肮脏计”。他们充分地利用了农民的自私、落后和工作干部的没有经验、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李有才板话》中《丈地》一章便提供了关于这一方面的非常出色的描写。

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界线是划分得十分清楚的。农民凭着他们的阶级本能和经验，对于这个分界一点也不含糊。我们只要看看，当小元还是积极分子的时候，那些“小字号的人物”对

他多么亲，而一当小元做了武委会主任，被地主同化之后，他们对他就疏远了。他们前后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他们从心底发出了两种不同的情感。两个农民在被指派给小元锄地的时候有段对话是妙极了，我只引其中的两句：

“小福道：‘头一遍是咱给他锄，第二遍还教咱给他锄！’小顺道：‘那可不一样！头一遍是人家把他送走了，咱们大家情愿帮忙，第二遍是人家升了官，不能锄地了，派咱给人家当差。早知道落这个结果，帮忙？省点气力不能睡觉？’”

作者也写了农民中的落后分子，如像《李有才板话》中的老秦，他“吃亏，怕事，受一辈子穷，可瞧不起穷人”，但他也有个好处，“只要年轻人一发脾气，他就不说话了”，他到底还是善良的。落后的人物在斗争的环境中也不能不起变化。不只这个老秦，还有《小二黑结婚》中的那两位“神仙”，到后来都有些变了。你也许觉得他们的变化太小，而且近乎消极吧，但作者是现实主义的，他不能把一个人物写成一个晚上就完全变了样子，像有些作者写人物转变那样。他只是着重写了环境的力量，他虽没有告诉你他的人物转变得怎样，但却叫你不能不相信他们的转变。

作者在描写他的人物上，其次一个特点是：他总是通过人物自己的行动和语言来显示他们的性格，表现他们的思想情绪。关于人物，他很少做长篇大论的叙述，很少以作者身份出面来介绍他们，也没有作多少添枝加叶的描写。他还每个人物以本来面目。他写的人物没有“衣服是工农兵，面貌却是小资产阶级”；他写农民就像农民。动作是农民的动作，语言是农民的语言。一切都是自然的，简单明了的，没有一点矫揉造作，装腔作势的地方。而且，只消几个动作，几句语言，就将

农民的真实的情绪、面貌勾画出来了。让我再从《李有才板话》中引用一段，这是写农民们在听到他们村长撤职的消息时的反映：

“一进门，小元喊道：‘大事情！大事情！’有才忙道：‘什么？什么？’小明答道：‘老哥！喜富的村长撤差了！’小顺从炕上往地下一跳道：‘真的？再唱三天戏！’小福道：‘我也算数！’有才道：‘还有今天？我当他这饭碗是铁箍箍了！谁说的？’小元道：‘真的！章工作员来了，带着公事！’小福的表兄问小福道：‘你村里跟喜富的仇气就这么大？’”

就这么短短的对话，听来是那样轻松，那样愉快，然而又是多么有力地表示了农民对于地主恶霸的仇恨心理。这种仇恨在《李家庄的变迁》中就成了爆发式的：农民们在龙王庙将汉奸地主李如珍活活打死的那个血淋淋的场面，也许会有人感觉到农民的报复太残忍了吧；但是请听一听农民怎么说的：

“这还算血淋淋的？人家杀我们那时候，庙里的血都跟水道流出去了！”

还有比这更正当，更公平的辩白吗？这些农民都是积极的活动的人物，所以他们的语言和行动是紧紧结合的。语言表现行动，而又凝成于行动之中；所以总是简练的，生动的。斗争的话言和日常生活的语言完全融合起来了。农民的机智和幽默在斗争的火焰中磨炼得光芒四射。他们把讽刺的话叫做“开心话”，叫做“扔砖头话”；这就是对豪绅地主、官僚、恶霸、“狗腿”们“扔砖头”，这是斗争的语言。就这样，作者从这些行动和语言中，将新的人物的性格显示出来了。

最后，作者在处理人物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明确地表示了作者自己和他的人物的一定的关系。他没有站在斗争之

外，而是站在斗争之中，站在斗争的一方面，农民的方面，他们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他没有以旁观者的态度，或高高在上的态度来观察与描写农民。农民的主人公的地位不只表现在农民充当主角的意义上，而是代表了作品的整个精神，整个思想。因为农民是主体，所以在描写人物，叙述事件的时候，都是以农民直接的感觉、印象和判断为基础的。他没有写超出农民生活或想象之外的事件；没有写他们所不感兴趣的问题（当然写别的主体的作品，又是另外一回事）。他把每个人物或事件在群众中的反映及所引起的效果，当作他观察与描写这个人物或事件的主要角度。农村的事情，还有谁比农民了解得更深切，更透彻的吗？就是对于农村中干部们工作的好坏，农民也是最正确的批判者。因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总是正确的。在《李有才板话》中，李有才的那些真实反映了群众意见的快板，如果单从形式上看，也许会被看作是中国旧小说所特有的“有诗为证”的一个变体，但我却以为它表现了赵树理同志创作上的一个重要精神。这是他创作上的群众观点。有了这个观点，人民大众的立场和现实主义的方法才能真正结合起来。

若有人怀疑，赵树理岂不只是一个农民作家吗？他的创作的和思想的水平不是降低到了“农民意识”吗？回答当然不是。他不但歌颂了农民的积极的前进的方面，同时也批判了农民的消极的落后的方面。他写了好的工作干部，这在农村中是体现无产阶级领导的骨干，没有这种骨干，农民的彻底翻身是不可能的；同时也批判了坏的工作干部。这好与坏的一个主要区别的标准，就是能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替他们解决问题。老杨同志和章工作员的区别就在这里。两个人物的对照的描写充满了现实的教育意义。

关于赵树理同志在人物创造上的基本特点，我所看到的就

是如此。现在我就来说一说他在文学语言上的创造。

他在他的作品中那么熟练地丰富地运用了群众的语言，显示了他的口语化的卓越的能力；不但在人物对话上，而且在一般叙述的描写上，都是口语化的。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和中国固有小说传统的深刻联系；他在表现方法上，特别是语言形式上吸取了中国旧小说的许多长处。但是他所创造出来的绝不是旧形式，而是真正的新形式，民族新形式。他的语言是群众的活的语言。他在文学创作上，不是墨守成规者，而是革新家，创新家。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以后，学习民间语言，民间形式的努力，产生了很多的优秀的成果。就在小说创作方面，也有成绩。但有些作者却往往只在方言、土话、歇后语的采用与旧形式的表面的模仿上下功夫。赵树理同志却不是那样。他执行了他自己作品的创造的任务。

在他的作品中，他几乎很少用方言、土语、歇后语这些；他决不为了炫耀自己语言的知识，用来装饰自己的作品而滥用它们。他尽量用普通的，平常的话语，但求每句话都能适合每个人物的特殊身份、状态和心理。有时一句平常的话在一定的场合从一定的人物口中说出来可以产生不平常的效果。同时他又采用了许多从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中不断产生出来的新的语言。他的人物的对话是生动的、漂亮的；话一到了他的人物的嘴上就活了，有了生命，发出光辉。

他在作叙述描写时也同样是用的群众的语言，这一点我以为特别重要。写人物的对话应当用口语，应当忠实于人物的身份。这现在是再没有谁作另外主张的了；惟独关于叙述的描写，即如何写景写人等等，却好像可以完全任凭作者自由驰骋，他可以写天上地下，沉潜于所谓美丽的词藻，全不管这些

与他所描写的人物与事件是否相称以及有无关系。要创造为工农兵所喜爱的文艺，这文学语言的世界有打扫一番的必要。人物与环境必须相称。如果环境中的甚么事物，在一个人物的心目中是不占地位的，即他对这事物不感兴趣，这事物与他的生活毫不相干，那末，作者为什么要耗费过多的气力去写它呢，难道仅仅为了自己个人的欣赏？我们来看一看赵树理同志怎样描写环境：

“阎家山这地方有点古怪，村西头是砖楼房，中间是平房，东头的老槐树下是一排二三十孔土窑，地势看来也还平，可是从房顶上看起来，从西到东却是一道斜坡。”（《李有才板话》）

这里，风景画是没有的。然而从西到东一道斜坡不正是农村中阶级的明显的区分吗？

再看一看他如何描写李有才的窑洞：

“李有才住的一孔土窑，说也好笑，三面看来有三变：门朝南开，靠西墙正中有个炕，炕的两头还都留着五尺长短的地面。前边靠门这一头，盘了个小灶，还摆着些水缸、菜瓮、锅、匙、碗、碟；靠后墙摆着些筐子、箩头，里面装的是人家送给他的核桃、柿子（因为他是看庄稼的，大家才给他送这些）；正炕后墙上，就炕那么高，打了半截套窑，可以铺半条席子，因此你要一进门看正面，好像个小山果店；扭转头看西边，好像石菩萨的神龛；回头来看窗下，又好像小村子里的小饭铺。”

这岂只是在写窑洞呵？他把李有才的身份和个性写出来了。

作者在描写人物的时候所使用的方法和语言也是非常特出的。他往往不从正面来写，而从人物的举止行动在别人身上所

发生的效果反衬出来。

他这样描写着小二黑的漂亮：

“小二黑是二诸葛的二儿子，有一次反扫荡打死过两个敌人，曾得到特等射手的奖励。说到他的漂亮，那不只是在刘家蛟有名，每年正月扮故事，不论去到哪一村，妇女们的眼睛都跟着他转。”

写小芹，也用了同样的方法：

“小芹今年十八了，村里的轻薄人说，比她娘年轻时候好得多。青年小伙子们，有事没事，总想跟小芹说句话。小芹去洗衣服，马上青年们也都去洗，小芹上山采野菜，马上青年们也都去采。”

最精彩的是写小芹的娘三仙姑到区上去的那一幕：

“刚才跑出去那个小闺女，跑到外边一宣传，说有个打官司的老婆，四十五了，擦着粉，穿着花鞋，邻近的女人们都跑来看，挤了半院，唧唧唧说：‘看看，四十五了！’‘看那裤腿！’‘看那鞋！’三仙姑半辈子没有脸红过，偏这会儿撑不住气了，一道道热汗在脸上流，交通员领着小芹来了，故意说：‘看什么？人家也是个人吧，没有见过？闪开路！’一伙女人们哈哈大笑。

把小芹叫来了；区长说：‘你问问你闺女愿意不愿意！’三仙姑只听见院里人说‘四十五’‘穿花鞋’，羞得只顾擦汗，再也开不得口。院里的人们忽然又转了话头，都说‘那是人家的闺女’‘闺女不如娘会打扮’。也有人说‘听说还会下神’，偏又有个知道底细的断断续续讲‘米烂了’的故事，这时三仙姑恨不得一头碰死。”

从上面的引用，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作任何叙述描写时都是用群众的语言，而这些语言是充满了何等的魅力呵！这种魅